

天下奇趣系列

TIAN XIA QI QU XI LIE

文化奇趣



《天下奇趣系列》，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趣味读物，共分五十方面的科学知识，进行了饶有趣味的介绍，内容新奇有趣，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可读性融为一体，能引导读者在趣味盎然的阅读享受中，受到科普知识的教育，开阔科学知识的视野。

袁伟华◎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1112587

• 天下奇趣系列 •



文化奇趣

袁伟华 主编



淮阴师院图书馆 1112587



延边大学出版社

78251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奇趣/袁伟华主编. —2版.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6. 12

(天下奇趣系列; 37)

ISBN 7-5634-1648-X

I. 文… II. 袁… III. 文化史—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K1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6803 号

天下奇趣系列

文化奇趣

袁伟华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北京市康华福利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0 字数: 640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1648-X/G · 371

定价: 998.00 元 (1-50 册)

内容简介

“天下奇趣系列”，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趣味读物，共 50 册。各册精选知识短文若干篇，分别对太空、大地、气象、海洋、岛屿、江河、湖泊、飞瀑、涌泉、山谷、岩石、洞穴、飞禽、走兽、游鱼、爬栖、昆虫、树木、花卉、藤草、果实、人类、野人、历史、文化、考古、法界、科技、军事、体育、音乐、艺术、建筑、景观、航天、探险、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城国、村镇、园馆、风俗、节日、部族、饮食、服饰、娱乐等五十方面的科学知识，进行了饶有趣味的介绍，内容新奇有趣，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可读性融为一体，能引导读者在趣味盎然的阅读享受中，受到科普知识的教育，开阔科学知识的视野。



目 录

灿烂的龙山文化	(1)
千古奇绝“西夏碑”	(5)
春联的由来	(10)
汉字、石锚、玉圭文书	(12)
佛教的发源地	(14)
诺亚方舟	(17)
古代公文签批趣闻	(20)
古代避讳的笑话	(24)
文章之最	(26)
书籍奇闻	(29)
奇书拾趣	(32)
现代报纸拾趣	(35)
稀奇古怪的报纸	(38)
鸡蛋民俗趣谈	(40)
商店的招牌	(44)
理发店的标志	(46)
厕所是国家文化的象征	(49)
漫话扇子	(51)
风筝趣话	(54)



天下奇趣系列

文化奇趣

笔的发展史	(58)
钢笔小史	(64)
单车的奇闻趣史	(66)
世界钻石趣闻	(68)
法国广告史话	(73)
信的趣闻	(79)

(1)	古文山水画的兴起
(2)	“朝夏西”拼音古干
(10)	宋由陆羽春
(13)	井文生于，静江，空好
(14)	书蜀文韵楚辞
(17)	衣食住行
(20)	同书世系又公升古
(24)	奇笑闹闹趣升古
(26)	录之章文
(28)	加有籍井
(32)	趣得井奇
(33)	趣得井奇升趣
(38)	趣得井奇升趣
(40)	趣得井奇升趣
(44)	趣得井奇升趣
(46)	趣得井奇升趣
(48)	趣得井奇升趣
(51)	趣得井奇升趣
(52)	趣得井奇升趣
(53)	趣得井奇升趣



灿烂的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诸多文明因素的持续积累，终于在龙山时代出现质的飞跃，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公元前 3000～公元前 2000 年的龙山时代，黄河流域的马厂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诸类型、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中晚期等等，中华大地的多种文化交汇、融合，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考古研究的成果证明，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期。

从现有考古发掘资料看，龙山时代的社会分工和分化日趋激烈，原始氏族平等一致的原则改变。社会成员分裂为贵族和平民，贵族中又分成地位高低不等的级别，少数贵族统治着占人口 80% 以上的平民，从而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多层社会结构。礼乐制度作为中华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是与中华文明一起诞生的。礼乐制度的核心，是贵族等级名分制度，用以确定尊卑贵贱、上下隶属关系，建立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财产的分配原则。因此，礼乐制度的确立，实际乃是进入文明社会（阶级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志。

龙山时代还具备了文明的又一要素；都市及大型聚



落。在考古发掘中，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发现了多处龙山时代的城址。经过确认，至少有 20 多座，面积从 1 万至 100 万平方米不等，以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者居多。著名的城子崖古城，面积 20 万平方米，在城外方圆 20 余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 40 多处龙山遗址。有趣的是，城子崖并非一座孤立的古城。从城子崖往东北，又有邹平丁公、临淄酮林、寿光边线王等几座古城，各相距 40~50 千米，每座城似乎都处在附近聚落群的中心位置，形成一个以城为中心的聚落网。与此相类似，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湾、酒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和湖南沅县城头山等 5 座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似乎在这一地区也存在一个以城为中心，而又以石家河为最大中心的聚落网。除了城址，一些没有用墙围护的大型聚落，亦具有某一地区中心的性质，此可以用良渚文化聚落遗址予以说明。良渚文化的聚落遗址大致分为三级。最高一级的中心聚落，是以余杭莫角为中心的遗址群。这是一处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由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高出附近地面 5~8 米，其上又筑有三处较小的高台，并发现大面积夯土基址，经过火烧的土坯和大型木构遗存，是一处巨型宫殿、宗教建筑群，抑或大土台本身就是一处台城遗址。而以莫角山为中心的 34 平方千米范围内，有 50 多处遗址，其中，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贵族墓地出土过大量玉器。寺墩遗址中部筑成土台，周围有壕沟环绕。

第二级中心聚落大多有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随葬



品有玉器、精致陶器；赵陵山、福泉山甚至还有殉葬人。葬制以及随葬品的种类、形制和花纹，与余杭良渚一致，只是数量和精美程度有差别。如玉器上的神徽图像，良渚有繁简两种形式，而其他地点往往只有简化形式。

第三级聚落则是一般村落遗址，居址附近有公共墓地，大多只是随葬陶器、石器的小墓。中原陶寺遗址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其大墓不但随葬器物丰富，而且有许多王室重器。在其周围2500平方千米范围，内，分布陶寺文化遗址60多处，十分密集。遗址面积多在1万至数万、10万平方米，个别达数十万至一二百万平方米，聚落间亦显示等级性。总之，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一般构成网状三级结构，似乎已经形成具有政治、宗教统辖关系的“都、邑、聚”格局。

龙山时代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都、邑、聚”三级聚落以及都城性质遗址中宫殿、王陵、其他礼制性建筑和礼器群的存在，表明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不同文化区内，以各种史前文化类型为特征的众多早期国家已经形成；这同史籍记载的黄帝至尧舜时期“万邦”林立的情景符合。毫无疑问，中华大地在龙山时代业已跨入文明的门槛。

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的。但中华在上述文明起源中心并不彼此孤立，相互封闭。自仰韶时代以来，各史前文化区系间已有频繁的接触、碰撞、交流、渗透，并且呈现互相认同的演变趋势。这种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与认同，在龙山时代达到高潮。公元前2500年前



后的陶寺文化，包含了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广大地区的多种文化因素，成为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早期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由于黄河、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各文化系统辐射中原，致使中原最终处于铸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中枢位置，并且发展为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的中心。

在龙山时代，中国已有铜制品和铸造工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从此，中华文明以独特的路径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螺矶山 Q&A 研究会)



千古奇绝“西夏碑”

11 世纪，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建立的西夏王朝，曾雄踞一方，与辽、宋王朝成鼎足之势。然而 200 多年后，随着成吉思汗铁骑的践踏，西夏却最终被元灭亡。这个神秘王国消失后，其史料和文字逐渐湮灭。今天，随着“西夏热”的兴起，研究西夏文字和这个神秘王朝的历史，在国内外蔚然成风。当人们要“破译”这个王朝的种种谜团时，一块“普普通通”的石碑越来越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这就是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的、西夏时期留存至今的唯一佛教石刻——“西夏碑”。有关专家评价，它是迄今所见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碑刻。

“西夏碑”的由来

1000 多年前，在黄河上游生息着一个能征惯战的古老民族——党项族。公元 1038 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在我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封建政权——“大夏”。因它在黄河以西，所以历史学家称之为“西夏”。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在当时形成了宋、夏、辽（金）“三国鼎立”的



局面。

立国后，西夏上层把佛教作为统治思想之一。为了发展佛教，他们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寺院和佛塔等。于是西夏境内佛刹林立，致使后人感叹“云锁空山夏寺多”。

当时凉州（今甘肃武威）是西夏国的西凉府，地处险要，佛教盛行。所以，建庙修塔时，西夏统治者自然不会忽视这个多民族杂居的“战略要地”。西夏天佑民安四年（1093年），由乾顺皇帝与皇太后下旨，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与钱财，重修凉州护国寺内因地震受到破坏的感通塔，同时修缮寺院，第二年竣工。这一年恰好是乾顺皇帝10周岁，为了给这个皇帝祈福，西夏兴办了隆重的佛事活动，并立碑赞庆。这块碑就是保存至今的著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西夏碑”。

内涵丰富的碑文

700年后的1810年秋，闲居在家的当地著名学者张澍与好友到地处武威城内东北隅的清应寺游览，偶然发现这里有座隐秘的碑亭。令人不解的是，碑身前后都用砖石砌牢，死死封闭。清应寺僧人代代相传，说砖石内有异物，故不能打开，否则将有灾祸降临。听到这里，学识渊博的张澍越发感到惊奇，他认为这里面肯定有某个鲜为人知的大秘密，便再三恳求僧人拆开砌封，并立下誓言，愿意承担一切损失。因张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寺僧不得不给面子，只好破例拆去了砌封。

墙内果然出现了一块奇特的碑刻，张澍发现其中一



面的文字似汉文方块字，但又不是汉字。才高八斗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上面的字他竟然一个都不认识。经研究，他认为这是早已“消失”的神秘西夏文。碑刻另一面的汉字“译文”让他大吃一惊，原来这碑刻竟是“失踪”数百年的、大名鼎鼎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堪称无价之宝。按正常思维，该碑理应放在护国寺，但西夏统治者为何将这一记载重要历史事件的碑刻，放在“档次”远不如护国寺的清应寺内，且严密隐藏？如今这仍是个难解之谜。

这块碑一面为西夏文，共 28 行；另一面为汉文，26 行。两种文字内容大体相同，都是叙述建立和修缮感通塔的详细情况。碑刻的汉文部分，一开始就叙述在阿育王建立的 84000 多座宝塔中，凉州塔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后几经兴废，至前凉张天锡统治时期，又建感通塔以安置佛的舍利。西夏立国后，这座宝塔祥瑞感应的故事很多。如西夏天佑民安三年（公元 1093 年）凉州发生地震，感通塔出现严重倾斜。当地政府正要派人抢修，这座塔竟出人意料地自行恢复原位，这点在碑刻上有所记载。该塔能在一夜之间自行恢复原位，的确难以解释。有人说这是余震的结果，但据行家介绍，这种“巧合”成功的概率很小。

如果说感通塔的“自行纠正”属自然现象的话，那碑刻上记载的“塔现灯光，骇退敌人”就有些不可思议了。据这块“西夏碑”上记载可以推断：当时，无论凉州百姓或西夏上层，都认为感通塔能安国佑民、消灾解难。



接着，这块碑刻上还叙述了乾顺即位后，西夏重视佛教，多次召集工匠修饰佛塔，使其焕然一新的情况，赞扬了皇帝和太后“发菩提心，大作佛事”的善举。碑文还记载了宝塔修成后所作的各种礼佛活动；并在开列了各种佛事如度僧、赦囚、赐钱物等数字后，录写了64句铭文；最后是书写碑文、篆额、主持或负责佛塔寺人员的职称和姓名。这区区26行汉字，书写了当时一段弘佛历史，内涵极为丰富。有关专家认为，如此“包罗万象”的佛教石刻，在海内外实属罕见。

破解“西夏文”谜团的钥匙

“西夏碑”高2.6米，宽1米，厚30厘米。碑首呈半圆形，边呈杀角，四周刻有花纹。碑首用西夏文篆字题额“敕感应塔之碑文”。两侧各有线刻会乐菩萨，作飞天状。它不仅是目前我国现存最大最好的西夏文碑，为研究西夏佛教提供了很多宝贵资料，而且碑的正背两面还分别刻着西夏文和汉文释文，是一部珍贵的西夏文、汉文相对照的“字典”，对破译古老失传的神秘西夏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那么当年西夏文又是怎样产生和“消失”的呢？据有关专家介绍，党项族的语言、文字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党项族本是羌族的一支，原来受吐蕃族统治，曾经借用藏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所以，西夏语同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西夏文字是党项人仿照汉族文字创造的一种记录当时党项族语言的文字，



它曾在西夏全境广泛应用，并且记录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西夏文字的构成形式完全仿照汉字，也是方块字，但笔画繁多。有会意、形声、转注等构造法，而且有草、隶、篆、楷四种字体。当时西夏不仅有自己的文字，而且当时的学者们对语言文字的研究还颇有成就，曾写出《同音》、《蕃汉合时掌中珠》、《五音切韵》等大批论著。

1227年，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横扫西夏全境。这些蒙古兵在西夏肆意烧掠。在生灵涂炭的同时，西夏诸多典籍也惨遭劫灭，其中大量珍贵无比的史籍和文物毁于战火；出于对西夏的仇恨，元代修辽、金、宋三史时，独不肯给西夏王朝修同等的纪传体正史，导致西夏史料湮灭亡佚，百不存一；再加上西方探险家疯狂地劫掠西夏原始文献资料等原因，到了元、明两代，西夏文字最终在其后裔中失传，同时这个立国近200年的封建王朝，也在历史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为人们所遗忘。以至今日，西夏竟成了一个“谜一样的王朝”。

有关专家说，要想解开西夏王朝的众多“谜团”，首先就得破译早已失传的西夏文字。考古学家虽然在被称为“中国金字塔”的西夏王陵内，出土了部分西夏文残碑拓片，但与《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相比，其价值却相差甚远。正因，如此，现存的这块“西夏碑”才显得珍贵无比。难怪早在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就正式公布该碑为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这的确在情理之中。

(赵光)



春联的由来

春联，也叫对联，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艺表现形式。旧俗，除夕以红纸书写吉祥词语，贴于门上，上下两联，诸偶对仗，称作对联。相传对联出于古时的桃符。在上古时代，人们没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把一些自然灾害误认为是神鬼在暗中作弄。据说，东海有一座度朔山，有一棵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下有神荼、郁垒二神，能食百鬼。有鬼作怪，则用苇索缚之喂虎。由此，民间认为桃木辟邪，神鬼畏惧。故俗在农历元旦，用桃木削板，画神荼、郁垒二神于其上，悬在门旁，以驱鬼辟邪。南朝梁宗怀《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

又有人传说对联产生于五代。蜀未归宋之前，公元九四六年，要过春节了，蜀主孟昶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嫌其词未工，随亲执笔题：“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其实此时已把对联贴在门槛间的东西了，也称为楹联了。《楹联丛话》序言说：“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是指此事，在民间并不流行。宋朝在贵族间流传互为赠答，苏轼在黄州时曾给友人题一联：“门大要容千人入，堂深不觉百男



欢。”王安石曾被革命导师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时题新年诗《元日》一首：“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除旧布新的节日里，从自然界联想到社会，主张要改革“积贫积弱”的状况，迎来一轮瞳瞳的红日和明媚的春天。诗中的“新桃换旧符”，就是指贴上新的春联，换去旧的春联。

春联之名是从明朝开始在民间流传的。赵仲邑在《蜗庐漫笔》中说：“在明太祖统治的年代，则不在桃木板上题字，而改在红纸上。明太祖定都金陵之后，一年除夕，他忽然传旨说：‘公卿士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副）。’”

（《簪云楼杂说》）从此，就有了春联之名。及至解放以后，春联又增加了新的内容。现在，城乡人民在春节之际，家家都贴上红红的春联，庆祝社会主义祖国的春天。

（大海）